

时逸人复兴中医之改革思想概述

王申和, 杨乐[✉], 亢力, 雷蕾

中国中医科学院,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, 100070

摘要 对民国时期著名中医改革家时逸人复兴中医改革思想进行总结, 包括反复强调中医改革的必要性, 反对“废医存药”, 反对“离道成术”, 注重中医教育, 提出复兴中医之“四化”, 即经验集中化实验化、药理生理化学化、诊疗机械化实际化、预防社会化政治化。认为其复兴中医改革思想可为当代我国医疗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, 值得在中医药深化改革领域借鉴。

关键词 时逸人; 中医改革; 科学化; 实验化; 实际化

时逸人 (1896—1966), 字益人, 号了一山人、折背叟。祖籍无锡, 出生于江苏仪征。自民国五年 (1916 年) 挂牌行医以来, 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医学实践与研究, 思想活跃, 在中医药改革方面亦多有见解, 有些主张至今仍值得借鉴。现将其复兴中医之改革思想概述如下。

1 改革思想概述

时逸人爱护中医, 但绝不墨守成规, 他认为中医改革十分必要, “中医之需要改进, 已成不可避免之事实, 借助于科学方法, 以改进中医, 已为全国多数学者及专家所公认, 若云中医不配改进, 中医无须改进, 此种论调, 实无存在之可能”^①。纵观时逸人一生, 都在坚定不移地推行中医药改革。

1.1 反对“废医存药”

针对民国时部分人对中医持“废医存药”的观点, 时逸人予以坚决否定。他对此反复论辩, 强调中医、中药密不可分; 认为“中医医方, 所以称善于世, 虽云经验充足, 而诊断病症, 其执简驭繁方法, 实以八纲为主体。抛却八纲之良规, 专求单方之经验, 此江湖走医之惯伎, 而村姬乡妇之所闻”^{② 39}。时逸人以日本维新时残害汉医导致的严重后果为历史教训, 明确指出“中药之应用, 乃中医历世相传经验之结晶。苟废除中医之经验, 惟专求化验中药成分之效用, 恐所获者少, 而所失者

多”^{③ 40}。为进一步解释, 时逸人还特意为此比喻“西医说, 中医可废, 惟中药尚有可用——此意实属任意诬蔑。譬如中国军队, 抗战胜利以后, 假使外人评判, 谓中国士兵不良, 惟枪械可用, 应当重赏枪械, 不必慰劳士兵——其立意与此相等——岂非笑谈?”^④

1.2 反对“离道成术”

时逸人重视中医医“道”的传承, 认为“医案诸书多矣, 愈出愈多, 愈趋愈下。市医之伎俩无穷, 而医已离道成术矣”, 并为此分析指出“近来欧风东渐, 科学维新。潮流湍急, 咄咄逼人。有识之士, 知非改进不足以图存也。改进维何? 进而求其理论是已。诚以今日中医之地位, 不进则退, 不存则亡! 而理论者, 乃事实之母。有精确之理论, 方有精确之事实, 此新学所以进步敏捷也。理论之悠谬, 即事实之悠谬, 此旧学所以感应迟钝也。若中医之不修理论者, 则其误甚矣。及时而图, 犹为未晚。而今而后, 吾知之矣”^{⑤ 725}。时逸人认为中医的精髓“当集多数医学专家, 本经验之特长, 考察古人之得失”^{⑥ 728}。

当时还有排斥中医的观点, 认为中医不科学, 时逸人对此反驳道“科学定义, 在尊重证据”, 而中医临证的全过程, 确实都很尊重证据, “以八纲为主体, 治疗以恢复生理机能为目的, 有原理原则可寻, 谓之暗合科学可也”^{⑦ 33}, 而中医疗效更不可否认, 大凡“实用之事, 经验优于学理。经验既已确定, 皆有科学原理存乎其间”^{⑧ 38}。

[✉] 通讯作者: 3058802679@qq.com

1.3 注重中医教育

时逸人在江苏行医十余年后注意到医学教育的重要性,认为要改变中医的处境,必须从中医的教育抓起,为此他开始组织国医讲习所,并拟成立中华全国医药书编辑社,意在提高中医素质。民国十七年(1928年),时逸人在上海创设江左国医讲习所,编撰《中国医学建设问题》,并担任中医专门学校教授、中国医学院教授、《卫生报》编辑等职。民国十八年(1929年),时逸人来到山西,担任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常备理事、编辑主任、医校教授、医院医师等职,著有《时令病》《传染病》《妇科》《病理》《处方》《审查验方》等,主编撰《山西医学杂志》近十年。时逸人曾供职中央国医馆理事,任推行处主任、学识整理委员会专任委员、编审委员、卫生署中医委员会常委、中国医学教育社理事等;在山西期间又兼任山西省卫生委员会委员、山西国医分馆馆长、太原高级医师检定委员会委员、太原市中医公会主席。时逸人极力主张教育的发展应以“整理医书为前提”,认为影响中医学进步的障碍有两个,一是迷信古人,一是迷信西医;提出在西医传入之时,中医更有必要整理改进,“不拘泥陈迹,不盲从异说,不谬托玄虚,不妄标臆见。切切实实,发挥设身处地之经验,借助于科学方法以整理之,希能树立中国本位之医学,以贡献于世界医学之林”^[6]。

2 复兴中医之“四化”

民国二十九年(1940年),时逸人在上海创办《复兴中医》杂志。在第一期就刊载《复兴中医之基本条件》^[7]一文,系统表述了他为复兴中医思考很久的见解,认为中医困窘之处绝对不在于疗效,而在于“学理之荒疏,经验之庞杂,假借名词之罗列,各家学派之不同,浅尝者,入主出奴,互相嫉视,致貽西医攻击之口实,言之殊堪心痛,所谓人必自侮,而后人侮之是也”;明确指出欲复兴中医,“惟在努力整理,以图自强”,即必须整顿改进中医,并将具体方法归纳为“四化”,即经验集中化实验化、药理生理化化学化、诊疗机械化实际化、预防社会化政治化。

2.1 经验集中化实验化

时逸人认为,中医学是“积数千年之经验,历数万人的探讨”才创立的“专门学说”,该学说独特之处在于“经验之丰富”,因为这种丰富经验“半在精神之灵辨,半在有效之良方”,两者结合,

才能够做到效如桴鼓。但是到了后世却日渐衰落,是因为“前代国家既不重之,而讲求身心性命之学者又高自标榜,视医学为小道,加以世医之家,父子秘传,师弟株守,视医术为传家宝,挟秘方为敛财具,所有经验,埋藏民间,年湮代远,失传者良多,洵今日中医衰落之原因也”。为此,时逸人提出解决方案,即将那些“虽学说不佳,而对于各科均有实地经验,如对于某一病,或某一症,有特别家传秘方,虽诸医束手者,亦能药到病除,历验不爽”的经验效方,“集中一处实地试验,特效者褒奖之,无用者废弃之”,并认为那样“必有惊人收获”。事实上,时逸人所言至今没有实现,中国古代很多传世经验效方仍然需要“实地试验”。

2.2 药理生理化化学化

时逸人对于现代医学的药理学、生理学与化学有所了解,甚为当时德国、美国、日本等国家不遗余力地研究中药制剂的方法所折服,并总结“中医衰微之原因,虽在经验不集中,而实在药物不化验,不能合于科学之正轨也”。如果对于各种中药“皆发生理化学之公式,悉加厘定,定其成分,制为方剂”,将不同性质的药物制成不同的剂型,如膏、结晶、粉、浆、油等;将“易变性之药,仿罐头食物制之,如人参、黄芪之类,以玻璃置。可变糟粕而为精华,普及中医原因疗法之专长,世界各国均可受其惠也”^[8]。一方面反映出时逸人对于中药自身问题的反思,“考中药经数千年之沿革,治疗特效,维赖经验丰富,惜未经科学之证实,化学之分析,有经验而无研究,其理不明,所谓验方而已”^[9];另一方面反映了特殊历史时期,时逸人对于科学所能带给中药药理新气象的深切期盼。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然不完善,但却可以为中医中药研究提供参考。

2.3 诊疗机械化实际化

时逸人在当时已经注意到中医诊疗过程中日渐出现的弊端,并指出机械化将会对中医诊疗发挥重大作用,“自来我国医学诊疗之事,极为简便,诊断不外望、闻、问、切,治疗不出按摩、砭石、针灸、汤剂,运用周而收效速。惟后世学者,神秘于切诊,轻于望、闻、问三事,遂缺物质之应用。汤剂学日益发达,得脏器治疗之宗师。按摩、砭石、针灸之术渐渐失传,遂貽治疗法之不充,殊为憾事”。时逸人认为,中医“宜于诊疗方法,趋于机械化之途径。在诊断上中医之精神灵辨,固为重要,器械之借助,亦所必须”,可为开现代中医

“望、闻、问、切、查”五诊合参之先河。而在治疗中,“中医长于内科,西医精于手术,中医见弃于人者,实因外科不进步,器械不设备。以后中医治疗,除内用丸散膏丹之外,宜用器械”,如此则中医外科的发展不足即得以弥补,“能利用西人之器械,则改进之能事备矣”。可见,在时逸人看来,西方技术带给中医学的不是冲击,而是一种自我改进、弥补不足的契机。

2.4 预防社会化政治化

时逸人认识到社会化政治化在疾病预防中的重要性,而这一认识确实难能可贵,可为现代中医“治未病”“养生保健”“健康产业”等提供借鉴。对于预防之重要意义,时逸人反复强调“预防一事,在医学上关系殊为重要”。所谓“一磅之预防,胜于十磅之治疗。因流行疾病有不易治者,并无不可防之者,防患于未然,则轻而易举。治疗于既发,则诸感困难。是预防之道,实健康之保障,不病之要则也。古人上工治未病,此我国古时注重预防之明证”^[1]。这点似可提示现代中国医政管理者高度注意,大病医保实属必要,小病预防医保更为重要。时逸人当时还注意到中医预防的优势和不足之处,“古医学上预防疾病之条件,节劳逸,慎饮食,严起居,调寒暑,寡思虑,戒酒色,洵千古不易之定律。惜无专书,语焉不详,是一大缺点”。针对当时存在“国无防疫之政,人无预防之识,医无隔离之学”的情况,主张“宜将预防疾病之法,集成专书,并使民众具此常识。然非政治上督促,难以收效也。预防之道,除遵守固有之精神卫生外,而物质卫生,亦不容忽视”。今天看来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做到,但仍有值得改进之处。

3 小结

以上为时逸人所提出的复兴中医的基本观点。时逸人认为中医要实现复兴,必须“改进整理,不守旧古说,不盲从新学。用科学方法,检讨过去错误,采纳现在特长”,最终达到“创造第三者之

医学”的目的;同时认为中医药改革不必担心被西医同化,因为在他看来“取人之长,固无伤国粹;用人之货,实有损利权”,中医之伟大复兴必须改革,改革形成“第三者之医学”时才是中医真正复兴实现之际。

一项中医药政策制定的成功与否,需要从其制定、实施和效果三个方面来进行整体评价,这个过程具体包括目标任务、信息收集、信息筛选、决策、实施和最后的反馈,这些环节形成一个有机的闭合系统^[2]。时逸人生活的时代制约其所制定政策的成功实施,但是他立足于中医学本位思考,深感中医学再也不能“鄙理论为空疏者”,所以他出仕不久,就立志构建自己的中医理论体系,为此数十年精勤不倦,汇通古今,整理医学,付出了毕生的精力,在中医改革方面确实提出不少真知灼见,至今仍应引起后人重视并进一步加以研究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时逸人. 谈改进中医 [M] // 时逸人医学论文集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11: 38.
- [2] 时逸人. 改进中医与制造国药 [M] // 时逸人医学论文集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11.
- [3] 时逸人. 我要说的话 [M] // 时逸人医学论文集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11: 58.
- [4] 时逸人. 医学演义宣言 [M] // 时逸人医学论文集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11.
- [5] 时逸人. 整理国医国术之主张 [M] // 时逸人医学论文集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11.
- [6] 时逸人. 研究中国医学的几个信条 [M] // 时逸人医学论文集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11: 48.
- [7] 时逸人. 复兴中医之基本条件 [M] // 时逸人医学论文集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11: 41-47.
- [8] 胡凌娟, 陈占禄, 李瑞峰, 等. 中医药健康服务业政策研究的必要性探讨 [J]. 医学与社会, 2014, 27(11): 60-61.

(收稿日期: 2019-07-19; 修回日期: 2021-02-25)

编辑: 崔京艳